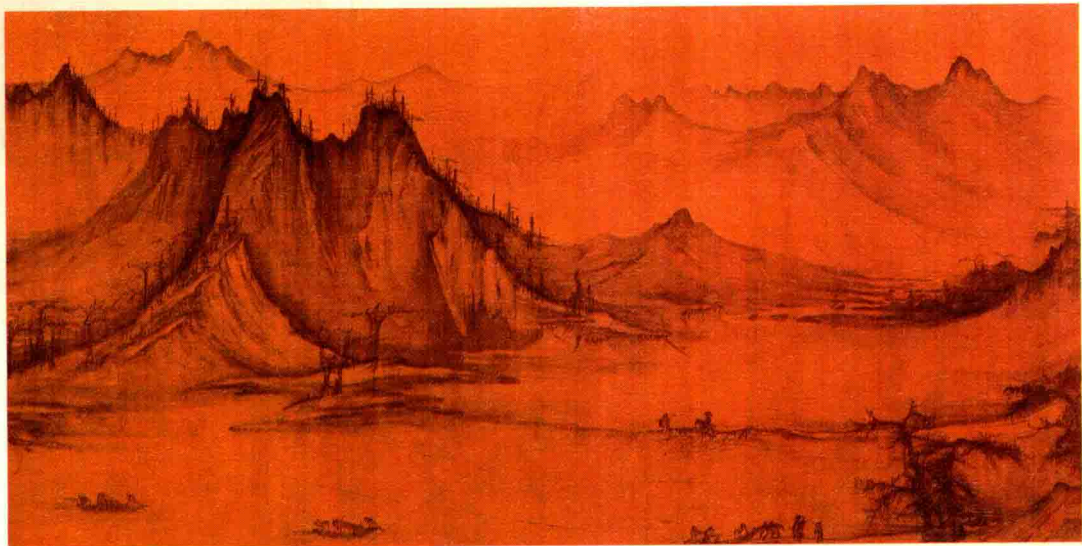




从内地到边疆

宋代政治与社会研究散论

■ 廖寅 著



科学出版社

从内地到边疆

宋代政治与社会研究散论

■ 廖寅 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10—13 世纪,中国社会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发展。两条主线为从唐到宋与从唐到辽、夏、金。三大板块为辽—金、宋、夏。以辽、金更替为界,三大板块表现为前、后三国鼎立。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不约而同地走在近世化道路上,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三大板块趋同的近世元素、深度的社会统一决定了中国社会必然走向“大元”。社会的深度统一反过来也决定了元朝以后中国核心区再也不会走向分裂。本书分为三编对这一观点进行了阐述。

本书适合对中国古代史、社会史感兴趣的读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从内地到边疆:宋代政治与社会研究散论/廖寅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1

ISBN 978-7-03-055430-7

I. ①从… II. ①廖… III. ①政治社会学—研究—中国—宋代 IV. ①D69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279686 号

责任编辑:陈 亮 耿 雪/责任校对:韩 杨

责任印制:张克忠/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11510

E-mail: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三河市骏志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9 3/4

字数:280 000

定价:8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10—13 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

(代序)

在中国古代史中,如何理解 10—13 世纪中国的历史走向,国内外学术界的分歧非常大。有的学者从传统汉族正统论的角度出发,视唐宋为中国发展的主线,如常说的“隋唐五代宋元明清”历史序列以及“唐宋变革”论^①;有的学者,尤其是国外以及国内港台学者,从游牧民族统治、支配农耕世界的角度出发,提出了“征服王朝”论,视辽、金、元等征服王朝为当时东亚世界发展的主线^②;有的学者则避而不论^③。大体来看,10—13 世纪的中国历史沿着两条主线、三大板块(北宋—南宋、西夏、辽国—金国)发展,一条是从唐到宋的演变;一条是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但深度分析,两条主线、三大板块事实上都走在相似的近世化道路上。无论是“唐宋变革”论,还是“征服王朝”论,都没有顾及中国的整体,不免失之于偏颇^④。

① 关于“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学术界已经有了许多总结性的论述。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2010 年第 4、5 期;〔日〕宫泽知之:《唐宋社会变革论》,《中国史研究动态》1999 年第 6 期;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 年第 2 期;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 11 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第 81 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年。

② 关于“征服王朝”论的来龙去脉,学术界也已经有了许多总结性的论述。〔日〕村上正二著,方广昌译:《征服王朝论》,《民族译丛》1982 年第 4 期;宋德金:《评“征服王朝论”》,《社会科学战线》2010 年第 11 期;熊鸣琴:《谁之征服?如何认同?》,《中国图书评论》2012 年第 10 期。

③ 这在民国时期的史学研究中表现得非常明显。民国时期,历史学大家辈出,但比较诡异的是,没有一个历史学大家以辽宋夏金为主要研究方向,如陈寅恪,虽然对宋代历史给予了非常高的评价,认为“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序》,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年,第 277 页),但其本人却很少研究宋史。民国时期正值“征服王朝”论流行,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志在救亡图存的民国学人对辽、宋、夏、金的历史有意无意地采取了回避的态度。

④ 姜锡东先生也注意到了“唐宋变革”论的偏颇,提出了“唐宋中国变革”论。姜锡东:《论“唐宋中国变革”的生产力基石》,《经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史年会论文》,北京,2016 年。

一、从天下大乱到前、后三国鼎立

公元 907 年是一个划时代，或者说新旧交替的年份。在这一年，大唐帝国正式寿终正寝，后梁、契丹等政权代之而起。在大唐帝国灭亡后的半个多世纪，中国似乎陷入了一种极度混乱的状态，表现在：①割据政权林立，仅汉族地区就先后存在过五代十国（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前蜀、后蜀、南平、南楚、南汉、南吴、南唐、吴越、南闽、北汉），其他事实独立而未正式建国的割据政权更是不胜枚举。②割据政权存在的时间非常短暂，如五代（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合起来才 53 年，如刘守光的大燕国更是仅存在 2 年而已。

不过，大混乱是短暂的，在大混乱的过程中，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重组，并逐渐形成了三大板块。10—13 世纪，在中国版图上前后出现了三大帝国（板块）鼎立的局面，前三国为辽国、北宋与西夏，后三国为金国、南宋与西夏。其中，辽国与金国是前后相替的关系，前、后三国的分期正是基于辽、金相替。

（一）前三国鼎立：辽国、北宋与西夏

辽国（907—1125 年）是以契丹族为主建立的国家，在前三国中建立时间最早，也是前三国中唯一与唐朝前后相续的国家^①。辽国整合了中国北部，横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从今天中国版图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北京全部，内蒙古、天津大部，河北、山西北部皆在辽国版图之内。

北宋（960—1127 年）承袭五代，是以汉族为主建立的国家。北宋整合了中国汉族的主要区域，如关中平原、四川盆地、长江中下游平原、珠江三角洲以及华北平原大部。正因为如此，许多学者视唐宋为此期中国发展的单一主线。

西夏（1038—1227 年）是以党项族为主建立的国家，原本国号“大夏”，因位于西方，北宋以来皆称其为“西夏”。西夏整合了中国核心区的西北部，从今天中国版图来看，包括了宁夏、甘肃大部以及陕西、内蒙古、青海的部分

^① 许多学者以公元 916 年为契丹国的开国之年，这是一种误解，其实契丹国早在 907 年就已正式建立，916 年只是仿汉制进一步完善了国家制度而已。

地区。

在前三国中，虽然辽国军队的战斗力最强，但宋朝的综合国力无疑是最强的，因此，在三边关系中，辽、夏以合作为主，互相支持对方的对宋战争或对宋外交诉求，共同牵制宋朝的北伐或西征，宋、辽，宋、夏则皆以斗争为主，多次爆发大规模战争。

（二）后三国鼎立：金国、南宋与西夏

在前三国中，西夏是最为弱势的一方，但由于宋、辽互视对方为主要竞争对手，西夏反而成为最为稳定的一方。从前三国到后三国，西夏是唯一少有变化的一方，宋、辽两方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公元 1115 年，辽国版图之中诞生了一个新的国家——女真金国，并最终取代辽国成为北方新的霸主，即“女真世奉辽正朔，又灭辽而代之”^①。

金国（1115—1234 年）是以女真族为主建立的国家，也是从前三国到后三国唯一新出现的国家。借助宋朝的牵制和联合攻击，金国仅用十余年的时间就灭了辽国。然而，令宋朝意想不到的，金国已经高速运转的战争机器无法因辽国的灭亡而冷却下来。在灭辽后仅仅两年，金国又将宋朝驱逐到了南方。相比辽国整合中国北部，金国则整合了中国北方。辽国虽然横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区的范围非常狭小，主要局限于燕云十六州；金国同样横跨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但农耕文明的范围大得多，涵盖了中国北方大部分农耕区。从今天中国版图来看，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北京、天津、山东、河南、山西全部，内蒙古、陕西大部，甘肃、江苏的一部分皆在金国版图之内。

南宋（1127—1276 年）是宋室南渡的结果。被金国驱逐出中原后，宋朝残余势力仓皇南下，在临安府（今浙江杭州）重建中央政权，并继承了北宋的南方地区。需要说明的是，南宋与北宋一脉相承，国号皆为“大宋”，“北宋”“南宋”之称是后世所加，目的是为了区分南渡前后之宋朝。

在后三国中，西夏的生存环境是最舒服的，西夏与南宋之间为金国所隔断，不用再承受来自于宋朝的压力，同时，宋、金两国的世仇心结又解除了金国对西夏的威胁。南宋不仅丧失了中原，徽宗、钦宗还成为金国的阶下囚，家仇国

①（宋）岳珂：《愧郈录》卷9《金年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恨使得南宋君臣恨金人骨，岳飞《满江红》就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写照^①。因为南宋的仇恨，金国不可避免地将主要的军事力量用在防范南宋上，与西夏之间则乐于维持现状，保持和平友好的关系。

二、鼎立背后的社会深度统一：近世诸元素的合力

在10世纪以前，中国经常出现诸国林立的局面，如春秋战国、魏蜀吴、十六国南北朝、五代十国。10—13世纪，中国先后形成了辽国—北宋—西夏、金国—南宋—西夏鼎立的局面，看似分裂时代的延续，实则中国社会在此一时期完成了深度统一。非常奇妙地是，自元朝统一中国后，除了改朝换代的特殊时期外，中国核心区再未出现分裂国家。10—13世纪，辽国、金国塑造了中国核心区的北线，西夏塑造了中国核心区的西线，宋朝塑造了中国核心区的南线^②。将前、后三国合并来看，今天中国诸省在前、后三国版图中的有：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河北、北京、天津、山西、宁夏、甘肃、陕西、河南、山东、江苏、安徽、湖北、四川、重庆、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福建、广东、广西、海南。这些省份构成了今天中国的核心区。

辽、宋、夏、金是中国最后一个大分裂时期。之所以分裂止于此，其根源在于10—13世纪中国社会的深度统一。深度是相对于浅度而言。从时间连续性来看，从浅度统一到深度统一对应的时间是从唐到宋。关于从唐到宋的变化，最有名的学说就是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提出的“唐宋变革”论^③。这一学说激起了世界各国学者的共鸣，“唐宋变革”逐渐成为一种普遍化的研究范式。综合

① 《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上，收拾旧山河，朝天阙。”（宋）岳飞：《岳忠武王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9页。

② 关于中国核心区的南线，在汉唐时期，南方的安南（今越南北部地区）曾长期属于中国，公元968年，即宋太祖开宝元年，安南走向独立，其后，虽然宋太宗、宋神宗也曾试图收复安南，但皆未获成功，公元1174年，宋孝宗以诏书的形式赐其国名安南，正式承认了安南的独立，也最终确定了中国核心区的南线。

③ [日]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期观》，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0—18页。内藤湖南的文章非常简略，其弟子宫崎市定随后对其学说作了详细补充。[日]宫崎市定：《东洋的近世》，刘俊文主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1卷，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153—241页。

百余年来研究，“唐宋变革”说的核心观点为：中国中世和近世的大转变出现在唐宋之际，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①。其表现在：

①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君主独裁、官僚政治取代了贵族政治，人民从贵族手中得到解放，财产私有权得到国家承认；在政治、社会转型中，科举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科举制相伴的文官政治奠定了中国近世政治的基础。②经济形态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取代了实物经济、庄园经济；宋朝政府成功地应用货币整合了国内经济^②。③思想文化上，平民化的新儒学（理学）、新文学（古文运动、词曲）取代了传统贵族化的注疏经学和骈体文学。

近世诸元素的合力造就了宋朝社会的深度统一：①贵族社会的消解是社会深度统一的标志之一。在贵族政治时代，贵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几乎都是世袭的，民众与其说属于国家，不如说属于各个贵族。在这种局面下，即使国家是统一的，社会也是分裂的。在官僚社会则不一样，人民直属于国家，官僚同样直属于国家，没有世袭特权。②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大发展是社会深度统一的标志之二。实物经济、庄园经济必然将社会从经济上割裂成许多小的板块。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则能将本来分裂的经济板块整合成一个大的统一体。③主流思想文化的大众化是社会深度统一的标志之三。宋以前的主流文化是贵族式的，只属于少数人，难以统一社会大众。宋代印刷术的大发展推动了社会教育的大跃进，同时，主流文化又有意识的向社会大众靠拢，使得全社会的思想文化趋于统一。以最重要的经学来说，宋以前的经学最重师承家法，传承多以家学的形式在世家大族内部传授，因而号称“专门之学”“一家之言”^③，宋以后则多由社会化的学校、书院传播，大众化的趋势非常明显。

“唐宋变革”论的焦点在宋朝，明显忽视了同时期的辽、夏、金。事实上，唐朝之后中国社会的发展不是单线的，而是双线的，即沿着两条主线发展。从

① 关于唐宋变革的性质，主流的观点认为是中国由中世向近世的转变，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是中国由古代向中世的转变，如〔日〕谷川道雄著，张邻译：《中国史的时代划分问题》，《史林》1987年第2期，第143—150页。笔者持宋代是中国近世开始的观点。

② 〔日〕宫泽知之：《北宋的财政与货币经济》，刘俊文主编：《日本中青年学者论中国史》（宋元明清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105—107页。

③ （清）蒋湘南著，李叔毅、龚佩琰、张大新点校：《七经楼文钞》卷1《经师家法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8—9页；（清）皮锡瑞著，周予同注释：《经学历史》，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2页。

唐到宋的演变已为学者所熟知，而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则少受人关注，但其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并不亚于从唐到宋的演变。在宋朝走向近世的同时，辽、夏、金也在走向近世，只不过步伐稍微缓慢一些^①。

说辽、夏、金走向近世，并非仅仅因为辽、夏、金与宋朝同时代，而是因为辽、夏、金同样具备了近世社会的核心元素，表现在：①政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上，部落贵族制走向瓦解，君主独裁体制走向成熟；与部落贵族制瓦解相对应，部落人民得到解放，与汉民一样成为国家的编户。②经济形态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走向成熟，将农耕区、游牧区联成一体。③思想文化上，主动向中国文化靠拢，逐渐形成统一的意识形态。详细论述如下。

（一）辽国

辽建国前，契丹政治上流行的是部落贵族世选制和集议制^②；建国后，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对部落贵族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变家为国”，将皇帝权力置于至上地位，逐步建立起了君主独裁体制^③。辽朝前期，部落贵族制色彩仍然非常明显，其标志就是头下军州制的存在。头下军州是契丹贵族的私城，贵族们将俘虏来的汉人、渤海人等聚于私城，纳为头下户。头下制本质上是一种封建领主制，头下户与领主之间具有严格的人身隶属关系，他们不是国家的编户齐民，而是头下主的私奴和部曲^④。但到辽朝中后期，头下军州制逐渐走向消亡，与此相应，头下户逐渐被纳入国家编户。辽圣宗统和十三年（995年）诏：“诸道民户应历以来胁从为部曲者，仍籍州县。”^⑤圣宗以后，文献和考古材料中再也未见新建的头下军州，原有的头下州军也逐渐向国家州县制过渡^⑥。

辽朝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再到大发展的过程。辽朝前期，商品交易很少，而且基本是实物交易，但到辽朝中期，货币经济开始

① 由于唐宋变革的研究已经非常深入，兹侧重分析从唐到辽、夏、金的演变。

② 李桂芝：《契丹贵族大会钩沉》，《历史研究》1999年第6期，第68—69页。

③ 杨军：《“变家为国”：耶律阿保机对契丹部族结构的改造》，《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9—28页。

④ 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95—97页。

⑤ 《辽史》卷13《圣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46页。

⑥ 刘浦江：《辽朝的头下制度与头下军州》，《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3期，第100页。

进入快速发展轨道。货币经济不但强化了辽国农耕区内部的联系，而且渗透进了游牧区，使分散的游牧部落开始走上了经济一体化道路，如上京地区，到 11 世纪中叶，钱币已经明显地在部族中使用。从辽国的货币流通来看，这一时期国际性的货币流通和商品贸易也取得了长足发展，宋朝的货币大量涌入辽国，甚至进一步流通到了朝鲜。20 世纪，朝鲜北部出土了大量这一时期的钱币，其中宋朝钱币最多，其次为辽国钱币^①。

辽国在思想文化上非常注重以中国文化来统一意识形态。“自契丹侵取燕、蓟以北，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②。“辽人嗜学中国”，“典章文物，仿效甚多”^③。辽圣宗、兴宗时期，契丹族已经开始以“炎黄子孙”^④自称。辽道宗自信辽国“文物彬彬，不异中华”^⑤，曾以白金数百两铸两佛像，铭其背曰：“愿后世生中国。”^⑥大致在辽道宗前后，契丹开始以“中国”^⑦自称。

（二）西夏

西夏建国前的政治、社会同样流行部落贵族制，“部（落）有大姓而无君长，不相统一”^⑧。西夏与辽以及后来的金不同的是，其地区自汉以来就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交错地带，汉族文化非常流行，因此，西夏建国时就已经非常熟悉中原的政治体制，西夏的政治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仿照宋朝而建，即“设

① [美]魏特夫、冯家升著，田林广译，王波然校：《辽朝的货币与信贷》，《昭乌达蒙师专学报》（汉文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6 期，第 10—14 页；秦佩珩：《契丹货币问题探源》，《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8 年第 1 期，第 57—60 页。

②（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0，庆历四年（1044 年）六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第 3640—3641 页。

③（宋）朱彧著，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卷 2，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142 页。

④ 赵永春：《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第 5 期，第 145 页。

⑤（宋）洪皓：《松漠纪闻》卷上，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第 6 页。

⑥（宋）晁说之：《嵩山文集》卷 2《朔问下》，上海：上海书店，1985 年，第 23—24 页；张江裁：《燕京访古录》，北京：中华印书局，1934 年，第 21 页。

⑦ 张其凡、熊鸣琴：《辽道宗“愿后世生中国”诸说考辨》，《文史哲》2010 年第 5 期，第 91 页；姜维公、姜维东：《“辽”国号新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 年第 1 期，第 50 页。

⑧《新五代史》卷 74《四夷附录三·党项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第 912 页。

官之制，多与宋同”^①。夏、宋两国的制度相似，但社会却不同，西夏建国时的社会仍保留着浓厚的贵族色彩，如李元昊“每举兵，必率部长与猎，有获，则下马环坐饮，割鲜而食”^②，因此，西夏的制度建设是略微超前的，政治变革略先于社会变革。正因为如此，西夏的制度容易发生反复，容易在汉制和党项传统之间来回改变^③。不过，随着君主集权的巩固，西夏的部落贵族制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到西夏中后期，部落的形式虽仍然存在，但已经褪去了贵族色彩，转变成地域性的乡村公社^④。

甘肃、宁夏地区早在汉朝就已纳入汉族文化圈，而且这一地带扼守丝绸之路要冲，因此，在建国前，西夏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的基础；建国后，西夏的货币经济、商品经济更是取得了长足发展，货币“成为西夏社会普遍的价值尺度、流通和贮藏手段”^⑤，到西夏后期，市镇商业贸易发达，货币经济达到了繁荣阶段。从西夏法典《天盛律令》来看，西夏的物品多以货币计值，官员的俸禄、赏罚多以货币支付，国家的部分赋税也以货币征收^⑥。而且，从现有出土钱币来看，西夏流通的货币主要是北宋的货币，表明西夏国际贸易的规模很大。在前三国中，西夏货币经济的水平高于辽，接近于宋。

西夏在思想文化上同样注重以中国文化来统一意识形态。“拓拔自得灵、夏以西……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所为皆与中国等”^⑦。景宗李元昊“仿中国，置文武班，立蕃学、汉学”^⑧，“译《孝经》《尔雅》《四言杂字》为蕃语”^⑨。毅宗李谅祚“遵

① 《宋史》卷486《外国二·夏国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4028页。

② 《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3页。

③ 李范文：《西夏通史》，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38—239页。

④ 吴天墀：《西夏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59页。当然，并不是整个西夏的部落都转变为地域性的乡村公社了，这主要是就核心区而言，在西夏的边疆地带仍存在着大量传统部落。

⑤ 牛达生：《从出土西夏窖藏钱币看西夏货币经济》，《宁夏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第85页。

⑥ 李学江：《从〈天盛律令〉看仁孝时期的西夏货币》，《固原师专学报》1998年第4期，第61—62页。

⑦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50，庆历四年（1044年）六月戊午条，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640—3641页。

⑧ （清）张鉴著，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点校：《西夏纪事本末》卷10《元昊僭逆》，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65页。

⑨ 《宋史》卷485《外国一·夏国上》，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3995页。

大汉礼仪以更蕃俗，求中朝典册用仰华风”^①“夏国自谅祚请去蕃礼从汉仪之后，常服中国衣冠”^②。惠宗李秉常心好中国制度，“下令国中悉去蕃仪，复行汉礼”^③。

（三）金国

金朝太祖、太宗时代，政治制度基本沿袭女真旧制，部落贵族制的传统根深蒂固，勃极烈贵族议事会制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君主的权力尚非常有限。但金熙宗以后，金朝政治制度开始全面走向君主集权，勃极烈制度被废除，君主独裁政治得以建立^④。金熙宗“颁新官制”，“大率皆循辽、宋之旧”^⑤，“置三省六部，略仿中国之制”^⑥。在女真传统中，唯独猛安谋克保留了下来。不过，猛安谋克制度本身就是革除部落贵族制的结果，“自穆宗号令诸部不得称都孛堇，于是诸部始列于统属。太祖令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一如县郡置吏之法”^⑦。“一如县郡置吏之法”，即将猛安、谋克官僚化。然而，金初猛安谋克的官僚化是不彻底的，仍然保留了贵族政治世袭的色彩。随着君主集权的强化，猛安谋克制度的贵族色彩逐渐淡化，“猛安人与汉户，今皆一家……皆是国人”^⑧，金熙宗以后，“猛安谋克官员职掌与同级汉官基本相同”，到金章宗时，猛安、谋克彻底完成了官僚化改造，“与汉人官制同一”^⑨。

金朝建立前后，商品交换还停留在实物贸易阶段，“其市无钱，以物博

①（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1，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50页。

②（清）张鉴著，龚世俊、陈广恩、朱巧云点校：《西夏纪事本末》卷23《绥城易寨》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③（清）吴广成撰，龚世俊、胡玉冰、陈广恩等校证：《西夏书事校证》卷25，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5年，第280页。

④刘浦江：《金朝初叶的都国问题——从部族体制向帝制王朝转型中的特殊政治生态》，《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第173—176页。

⑤《金史》卷55《百官一》，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216页。

⑥（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84，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388页。

⑦《金史》卷128《循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757页。

⑧《金史》卷88《唐括安礼》，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936页。

⑨程妮娜：《论猛安谋克官制中的汉制影响》，《北方文物》1993年第2期，第58—59页。

易”^①，“买卖不用钱，惟以物相贸易”^②。随着金灭辽国、北宋，辽国、北宋发达的货币经济很快注入进了金朝社会，辽、宋旧钱通行于金国全境。到中期，随着商品经济走向繁荣，金朝开始大力发行自己的货币，首先是纸币（交钞），其次是铜钱，其中纸币的发行量更是走向泛滥，“专以交钞愚百姓”^③。货币经济大潮席卷了女真族原实物贸易区，近年来，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以及内蒙古东南部等地出土了大量金朝钱币，既有金朝自己发行的钱币，又有宋朝钱币，这表明女真族发祥地同样被卷入了货币经济大潮之中^④。

“辽以释废，金以儒亡”^⑤。相比辽国、西夏，金国在以中国文化统一意识形态方面做得更加彻底，金熙宗以后大行中国法，官制、律令、礼乐等皆近中国^⑥。据赵永春的考证，《金史》中共出现“中国”14次，其中3次指中原地区，其余均指金朝，表明金人进入中原地区以后逐渐以“中国”自居^⑦。

与宋朝一样，近世诸元素的合力同样造就了辽、夏、金各自社会的深度统一。因为部落贵族制的消解，国亡之后族亦难存，所以，辽国之后再无契丹，西夏之后再无党项。女真似乎是例外，金亡之后女真族仍在关外（东北地区）顽强地生存下来，并在后来建立起了大清帝国。女真之所以例外，是因为金朝关内外女真走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关内女真在君主集权和官僚制下逐渐褪去了部落色彩和贵族特性，成为国家的一般子民。作为女真族的发祥地，关外女真在国家的特别优待下得以置身于社会变革之外，较多地保留了女真的传统和原貌。金世宗在回忆上京会宁府时就说：“尝见女真风俗，迄今不忘。……甚欲一至会宁，使子孙得见旧俗。”并说：“女真旧风最为纯直……敬亲戚，尊耆老……旧风不可忘也。”^⑧儒家本身就“敬亲戚”“尊耆老”著称，金世

①（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39《初兴风土》，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52页。

②（宋）宇文懋昭撰，崔文印校证：《大金国志校证》卷40《许奉使行程录》，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569页。

③《金史》卷48《食货三》，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069—1078页。

④杨君：《金朝铜钱货币流通贮藏形态管窥——以出土金朝钱币实物为中心》，《中国钱币》2015年第6期，第3—11页。

⑤《元史》卷163《张德辉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3823页。

⑥（金）刘祁：《归潜志》卷12《辩亡》，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35—137页。

⑦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4期，第1页。

⑧《金史》卷7《世宗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58、159、164页。

宗却非常怀念上京敬亲戚、尊耆老的“旧风”“旧俗”，这表明关外女真耆老的地位远远高于关内，关外当始终维持着贵族制传统。所以，金朝灭亡后，关内再无女真，关外女真却以相对旧的、原始的形式保留了下来^①。

当然，说辽、宋、夏、金走向近世，主要就辽、宋、夏、金的主体民族和核心区而言。至于各国的羁縻少数民族，其社会发展普遍滞后于主体民族和核心区，自然谈不上近世化。

三、走向“大元”：中国历史的必然

10—13 世纪，中国社会虽然在空间上两度分化成了三大板块，但各板块都在不约而同地走向近世，走向深度统一，政治体制、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思想文化都在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社会的深度统一和趋同发展内在的要求各板块走向合一。元朝统一中国，看似是因为蒙古帝国武力的强大，实则是武力统一恰好适应了 13 世纪中国社会走向合一的内在要求。比较来看，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其他地区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唯独中国，虽有改朝换代，但再也没有分裂。

有意思的是，从元朝开始，中国王朝的国号第一次跳出了地名的窠臼。清代史学家赵翼说：“三代以下建国号者，多以国邑旧名。……世祖至元八年……始建国号曰大元，取‘大哉乾元’之义，国号取文义自此始。”^②的确，元以前，中国历朝国号皆以开国皇帝的发祥地或者封地命名，夏、商、周、秦、汉、魏、蜀、吴、晋、隋、唐、辽、宋、夏、金等无不如此。元朝国号“大元”，取自《易经》“大哉乾元”。“大哉乾元”出自《易经》首卦《乾卦》卦辞“元亨利贞”的第一字。乾卦象征天，“元”为大、首、始之义，所以“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大元”国号象征着天下一统。事实上，在改国号为“大元”前，世祖忽必烈已经在年号上作天下一统的文章。公元 1260 年，忽必烈

① 清朝同样将发祥地置于社会变革之外，但因近代西方列强的强力渗透，这一政策最终破产。王振科：《清代东北封禁政策初探》，《四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2 年第 3 期，第 42—49 页。

② （清）赵翼撰，王树民校证：《廿二史札记校证》卷 29《元建国号始用文义》，北京：中华书局，2007 年，第 670 页。

即大汗位，建年号为中统，意思就有“天下（中国）一家之义”^①。1264年，忽必烈改年号为至元，取《易经》“至哉坤元”之意。“至哉坤元”出自《易经》次卦《坤卦》卦辞“元亨利牝马之贞”的第一字。坤卦象征地，“至”为极、最之义，“至元”同样蕴含着天下一统之义。所以，元末明初学者叶子奇说：“（元）天下一统，取《大易》‘大哉乾元’之义，国号曰大元，取‘至哉坤元’之义，年号曰至元。”^②

“大元”国号意味着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后大一统观念出现重大转向。此前的大一统王朝，无论是秦、汉，还是隋、唐，皆是以一地之名作为全国的国号，这明显是武力征服观念的体现，而非社会统一的内在要求。地名国号对征服者是荣，对被征服者则是耻，就像秦灭六国，刘汉灭项楚。忽必烈在《建国号诏》中说：“为秦为汉者，盖因初起之地名；曰隋曰唐者，又即始封之爵邑。是皆徇百姓见闻之狃习，要一时经制之权宜，概以至公，得无少贬。”^③传统国号皆徇“狃习”，有损于“至公”。《易》为六经之首，六经又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新式国号提炼自《易经》，源于中国社会公认的文化传统，表明大一统不仅仅是武力的征服和空间的统一，更是整个社会的内在统一。如果单看元朝，还无法看出这种转向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然而，继元而起的明、清两朝，其“大明”“大清”国号同样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再也未用地名^④。这表明，中国社会走向深度统一导致大一统观念的重大转向是历史的必然^⑤。

元朝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无须赘言，然而，不少学者却惋惜，元朝同时中断了唐宋变革的进程，使得自宋以来的近世化趋势发生了逆转^⑥。这类观点并非凭空臆想，而是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不过，很少有学者注意到历史书写本身的缺陷。现有关于元代的史料，绝大部分都是由汉族文人书写的。历史上汉族

① 陈高华、张帆、刘晓等点校：《元典章》卷1《诏令》，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页。

② （明）叶子奇：《草木子》卷3下，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61页。

③ 陈高华、张帆、刘晓等点校：《元典章》卷1《诏令》，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8页。

④ 关于明清两朝国号，参见杜洪涛：《明代的国号出典与正统意蕴》，《史林》2014年第2期，第52—57页；叶红、胡阿祥：《大清国号述论》，《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0年第4期，第65—77页。

⑤ 朱希祖认为“大元”国号可以“消除地方及种族之色彩，使异国异族之人，失其外族并吞之观念”（朱希祖编著：《后金国汗姓氏考》，《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第1种上册，1933年，第20页），此说固然有理，但未顾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必然性。

⑥ 周良霄：《元代史》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李治安：《元和明前期南北差异的博弈与整合发展》，《历史研究》2011年第5期，第59—77页。

文人“华夷相分”的观念本身就根深蒂固，加之元朝将汉人、南人在民族分等中置于较低的地位，同时又将儒士地位边缘化，这些因素导致元代以来的汉族文人不可避免地“对元朝抱有不同程度的偏见和成见，典型的如王夫之，认为元亡宋，是‘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①。这些偏见和成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汉族文人在历史书写中扭曲元朝的历史实际，如常说的‘贫极江南，富称塞北’^②，就与历史实际有非常大的出入。

事实上，在元朝统一南宋之前，蒙古帝国的中国部分已经走在了近世化的道路上。公元 1260 年，忽必烈继承汗位后，大力推动君主集权和官僚制建设，逐步削弱贵族的特权，“取消官员的世袭制而代之以迁转之法”^③。在制度建设的同时，忽必烈也非常重视经济领域内的深度统一，开始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交钞），用货币来整合国内经济。同样，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了国家的深度统一，忽必烈在多民族的多元文化中选择了儒家文化作为主流的意识形态，“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④，“帝中国，当行中国事”^⑤。经过十余年的建设，1271 年，忽必烈正式将大蒙古国改组成为中国式的元朝。改组后的元朝与南宋社会已无本质性的差异，一旦以武力实现空间上的统一，整个中国社会的深度统一就自然形成了。

正因为 10—13 世纪辽、宋、夏、金社会不约而同地走向深度统一，具备了相似的近世元素，当元朝统一夏、金、宋后，三大板块很自然地合成一个统一体，并且是一个再也不会分裂的统一体。

对于所谓元朝相对于南宋的退化，很大程度上是元代以来历史书写扭曲记载的反映，是哈哈镜式的景象，并非真实的历史本身。除了汉族和儒生的政治地位受到严重影响外，元代中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并没有受到太多的冲击，依然在沿着西夏、金、宋时的道路向前发展。就南宋地域的演变来说，社会变革，元代非但没有倒退，反而进一步走向完善和定型，即“酝酿于北宋，开始

①（明）王夫之著，舒士彦点校：《宋论》卷 15，北京：中华书局，2003 年，第 260 页。

②（明）叶子奇：《草木子》卷 3 上，北京：中华书局，2010 年，第 55 页。

③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年，第 6 页。不过，元朝对贵族制的打击并不彻底，尤其是在蒙古本土，传统贵族制始终占有重要地位。

④（元）郝经撰，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卷 37《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515 页。

⑤《元史》卷 160《徐世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 年，第 3769 页。

于南宋，完成于元代”^①；经济变革，元代重农而不抑商，经济自由度比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货币经济、商品经济的水平都要高于南宋，货币市场空前统一^②，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开始出现全国性的商帮^③，经济总体水平也有较大幅度提升，“江浙财赋，居天下十七”^④；思想文化变革，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南宋的理学在元代都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广度上扩张到整个中国，深度上渗透进基层社会，从而奠定了理学在元、明、清时期中国主体思想的地位。

① 王瑞来：《从近世走向近代——宋元变革论述要》，《史学集刊》2015年第4期，第83页。

② 元朝是中国古代第一个在整个中国统一发行纸币的王朝。（清）魏源：《元史新编》卷87《钞法》，续修四库全书编委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31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78—379页。

③ 存理：《元代回回商人的活动及其特点》，《宁夏社会科学》1998年第1期，第17—23页。

④ 《元史》卷183《苏天爵传》，北京：中华书局，1976年，第4226页。